Globethics Repository



扬弃异化文化的生态伦理向度--对史怀泽《文化和伦理》的文本解读[Abandoning the alienated cultural's ecological ethics dimensions: Interpretation of Schweitzer ‘s "Culture and Ethics"]

This page was generated automatically upon download from the Globethics Repository. More information on Globethics see https://www.globethics.net. Data and content policy of Globethics Repository see https://repository.globethics.net/pages/policy.

Item Type	Article
Authors	孙, 道进
Publisher	中共重庆市委党校
Rights	With permission of the license/copyright holder
Download date	2026-11-08 02:10:59
Link to Item	http://hdl.handle.net/20.500.12424/180970

孙道进：异化文化再异化的生态伦理向度——对史怀泽《文化和伦理》的文本解读

孙道进

[内容摘要]　自近代以来，在“知识就是力量”的“神话”感召下，人们对科学知识以及作为其物化形态的物质财富的单向度追求，破坏了人类的精神家园，使人类陷入了“精神的遗忘”。多维度的整体性的文化也因此成了单向度的物质文化并走向了人类的对立面：造成并加剧了人与自然关系的紧张，消解了人的主体性、创造性和否定性维度。因此，要扬弃异化文化，就必须重建人类的精神文化，即树立敬畏生命的伦理精神并以此作为文化之舟的航行之舵。如此，文化才能成为人的文化，人才能成为文化的人；自然的和谐、稳定和美丽才能得到真正的保护；人道主义与自然主义才能走向真正的融合。

[关键词]　文化；整体性；异化；科学知识；敬畏生命

史怀泽是20世纪法国的一位伟大哲学家、神学家和医生，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和生物平等主义的创始人。他的著作《文化和伦理》一书，诠释了文化与文化进步的内涵，揭示了文化的显性危机及其隐性根源，指明了扬弃异化文化的理想进路，即赋予文化以生态伦理的价值向度。今天，重新解读史怀泽的《文化和伦理》一书，对于缓解全球生态环境危机、打破人类“单向度”的“沉沦”状态、重建人与自然的和谐具有重大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一、单向度的科学知识：文化异化的认识论根源

史怀泽认为，以知识的增长或财富的增加为唯一价值诉求的单向度的文化走向了人的对立面，使得人与非人类的生命受到了极大的威胁；文化与文化进步是一个包括知识增长在内的多维度的系统性范畴；错把单向度的知识增长等同于文化进步本身，这是文化走向异化的认识论根源。在《文化危机和它的精神原因》一文中，史怀泽对此作了较为深刻的哲学分析。

1.“不自由状态”与生态危机：文化异化及其表现

文化本是物质文化、行为文化与精神文化三位一体的同一或整体。但是，由于近代机械论自然观和主客二分的思维方式的建立，知识取代了上帝，成了权力与财富的同义语。在“知识就是力量”的“神话”鼓动下，“知识即财富”的理念深入人心并且获得了“客观的普遍有效性”；对知识的追求和对财富的渴望成了人类文化的唯一价值向度。由此，多维度的人类文化被单向度化了，即单向度化为知识文化或作为其物化形态的物质文化，相应地，文化不再是人的文化，而是

人的主宰；人也不再是文化的主体，而是文化的宾词。文化的异化压抑着人类的生存，毁灭着非人类的生命。

其一，人消失在物质的堆积与技术的股掌之中，人的革命性、主体性与批判性维度丧失殆尽。近代以来，知识的与日俱增给人类带来了巨大的物质财富。然而，人类的精神之花并没有随着物质的雨露滋润而盛开，反而却日渐枯萎或凋零。人，这个昔日大地的征服者，也日益感到孤独与迷惘，成了无“家”可归的精神难民。“物质成就对文化带来的最普遍的危险是：由于生活条件的改变，人大量地从自由进入不自由的状态。”[1]过去耕作于“桃花源”中的农民、自由自在的手工业者和独立的商人，现在却成了大企业中自动化生产流水线上的一个个“小零件”——总是重复着一个固定不变的机械动作。“由机器带来的变革，我们大家几乎都受到太规则化、太死板、太紧张的劳动的折磨。我们难以集中心思进行反思。家庭生活和儿童教育发生了危机。我们大家或多或少都有丧失个性而沦为机械的危险。”[2]

就这样，科学知识、生产工具和劳动对象，这些确证人的本质力量的客体性存在，反到取得了某种程度的自律性和独立性，成为一种支配和统治人的给定性存在，“文化理想也不再能被清醒地思考，而是在迫切的生存斗争中被扭曲。”机器的人化和人的机器化严重消解了人的主体性、批判性和否定性维度，人成了知识的奴隶或技术的奴隶，准确地说，成了他人的奴隶。“当代人整个生活受到的影响导致他失去对自己思想的信任。在他所听到和读到的一切中，到处充斥着他应屈从的在心灵上依赖别人的精神。他处在与其相反的人格之中，处在已掌握了他的政党和团体之中，处在他的各种生活关系之中。他由多方面和被多种方式影响着，从掌握了他的（拥有对其权利的）伙伴那里获取为生活所必需的真理和信念。时代精神不让他达到自我。”[3]日益完善的经济、社会和政治机构，越来越多地控制着人们的权力，以至于凸显个性、表现自我竟然成了一种令人嘲笑的奢望。

其二，生命挣扎于知识及其物化形态的淫威之下，自然的和谐、稳定与美丽日渐消失。科学知识，作为工具理性，极大地提高了人类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的能力。在科学知识的视野里，自然不再被看作是人“无机的身体”，人也不再被看作是自然的生成；自然不再是人类的“母亲”，而是人的奴隶，人也不再是自然的伙伴，而是自然的主人。借助于科学技术，人“不仅支配着他身体内的物质力量，而且还支配着自然中的物质力量，并能利用这种力量。作为人，他能利用自己的体力拉弓放箭进行远距离的杀伤。作为超人，他能通过特制的装备利用产生于混合化学材料迅速燃烧的能量。这使他能使用威力巨大的炸弹，并把它投掷到很远的距离之外。”[4]手执着科学技术的利刃，人类对大自然展开了肆无忌惮的开采与掠夺，对非人类的生命进行着惨无人道的猎杀与灭绝。

森林在烈火中燃烧，水体在农药中变质，空气在污染中弥漫；“蚂蚁在那里挣扎，甲虫在艰难地爬行，而蠕虫则蜷缩起来”……大自然正在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毁灭性的摧残。“世界是美妙中的可怕，充满意义中的无意义，欢乐中的痛苦。”[5]技术的发展使得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成为现实，战争的规模、影响和破坏力空前巨大，人类不得不共同处于战争的废墟之中，没有战斗人员和非战斗人员之分，也没有胜利者与失败者之分。高技术武器的迅猛发展还使得人类的战争自信心大大增强，纷纷把战争看作是“净化政治空气的雷雨”，彼此争强好胜、互不退让，并动辄以战争作为解决问题的唯一手段。“我们的非人道比前人的非人道更危险。由于拥有核武器，毁灭

生命的可能性和诱惑力对我们已发展到不可估量的程度。由于技术的迅猛进步，最可怕地毁灭生命的能力已成为当今人类面临的厄运。”[6]在谋杀机器的意志面前，文化不得不羞愧地低下它那高贵的头颅，由人道之光照亮的正义与信任正日渐离我们远去。

2.单向度的科学知识：文化异化的认识论根源

文化本是个多维度的系统性范畴。史怀泽认为，文化是由物质文化、行为文化与精神文化有机组合而成的“文化圈”或“文化场”。“从外部，即从纯粹经验方面来定义，完整的文化是：实现知识、能力和人的社会化的一切可能的进步，并由此共同促进个人的内在完善，即文化的本来和最终目的。”[7]在史怀泽看来，对文化范畴的把握要从三个层面上展开：第一，文化是一个有机整体或多维度的概念，它不仅包括科学知识以及由此带来的物质进步，还包括人的各种能力——生理能力、认识能力、价值判断能力的完善，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与周围事物（自然、他人、社会）和谐相处、团结协作、并对他们高度负责的伦理精神。与文化范畴的内涵相对应，史怀泽认为，对文化进步的解读也必须从三个方面加以把握：一是“知识和能力的进步”，二是“人的社会化的进步”，三是人类“精神的进步”。[8]此三者的耦合与统一是衡量文化是否进步及其进步程度的参照标准和内在尺度。

但是，自文艺复兴特别是近代工业革命以来，在科学理性主义的感召下，人们误以为“知识的增长＝物质财富的增加＝文化的进步”，本应该是寓知识、思想和伦理于一体的整体性文化被“现实”的手术刀肢解得支离破碎，只剩下知识或财富的单一性维度。“物质成就并不是文化，它只有在文化信念使其在个人和总体完整的意义上发挥作用时，才成为文化。但是，由于为知识和能力的进步所迷惑，我们不考虑由于轻视精神文化而陷于什么危险之中，我们使自己天真地满足于我们巨大的物质成就，并迷失于对文化的难以令人相信的肤浅理解之中。我们相信事实之中的进步，我们不是思考理性的理想，并着手根据它去改造现实，而是为空虚的现实意识所迷惑，要满足于失去理想的现实。由此，我们失去了对于事实的任何影响。”[9]

把文化的多维性削减为物质财富的一维性，或科学知识的一维性，必然导致人与自然关系上的人类利己主义。人类利己主义认为，人是所有生命中唯一有理性的动物，是唯一能发现并运用科学知识的动物。凭借科学知识的利器，人类可叫河水让路，可叫高山低头。因此，自然界只不过是人类的能源储存库或货物储存仓，只不过是人类实现自己目的的工具和手段而已。这种利己主义的恶性膨胀，使得人类对于在痛苦中呻吟的动物盲目不仁或熟视无睹，甚至把别人对于动物的同情讥讽为“不可理喻的多愁善感”。由此，人与自然的关系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紧张。“受制于盲目的利己主义的世界就像一条漆黑的峡谷，光明仅仅停留在山峰之上。所有的生命都必然生存于黑暗之中。”[10]自然环境的恶化正在急速加剧，人类陷入了“无文化和无人道之中。”这一切都是由我们对于文化进步的狭隘化理解所造成的。

文化的整体性和系统性表明：文化进步与科学知识的增长是两个异质性的概念。把科学知识的增长等同于物质财富的增加再等同于文化进步本身，就是把要素看成为系统、把部分等同于整

体。这种对文化整体性和系统性的形而上学肢解，正是导致人类文化衰败的认识论根源。

史怀泽关于异化文化及其对人类价值精神的消解的论述，与马克思的劳动异化理论、胡塞尔晚年关于现代科学世界是对前科学的“生活世界”及其自在的意义世界的遗忘、韦伯关于工具理性的膨胀及其对价值理性的压抑，以及齐美尔、卢卡奇、马尔库塞、哈贝马斯等人关于科学异化的理论见解具有异曲同工之处；他把文化异化的根源归因于文化本身的“既定的目标”即科学知识或物质文明的单向度发展上，归因于人类的信念、伦理、哲学等精神文化的荒芜，并由此提出了科学与道德、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相互渗透、互相融通的必要性和紧迫性，这与马克思·韦伯关于科学好比一张地图的见解、康德关于“头顶的星空”与“心中的道德律”的提法在内容上是一致的。但是，由于阶级立场和视野的不同，史怀泽没有看到异化文化背后的阶级历史原因，即资产阶级的“不负责任、自私、贪婪、愚昧无知和其他的人为的缺点”[11]，没有像马克思那样从历史唯物主义的高度来审视、批判与剖析异化文化及其成因。这是其文化观的美中不足之处。

二、生态伦理向度：扬弃异化的理想进路

史怀泽认为，精神文化是人类文化的核心要素，是文化与人相互生成的内在根据，而敬畏生命的伦理精神又是这个“核心”的核心，是文化进步的质的规定性，是扬弃异化文化的理想进路。在《要求和道路》一文中，史怀泽对此作了详尽的诠释与说明。

1.精神伦理进步：文化进步的内核

史怀泽特别看重文化进步中的“精神”伦理因素，甚至把文化定义为“人和人类在所有领域中所有进步的总和，并在这一意义上，它有助于作为进步中的进步——个人的精神完善。”[12]他认为，正是“精神进步”使人脱离了动物的野蛮特性而日益禀赋人文精神，成为作为人的动物而不是作为动物的人。因为在一个由物质文化、行为文化和精神文化共同构成的“文化场”中，精神文化对于文化形态的形成有着特殊的意义：它体现着文化主体的价值取向，是把某一文化形态与其他文化形态区别开来的主要依据；精神文化是行为文化的“心灵”或“大脑”，行为文化只不过是精神文化的外显或张扬而已；精神文化还是物质文化的意义给予者，它赋予物质文化以文明的意义——尽管，从本体论维度看，物质文化是精神文化的基础，但是，物质文化并不是文化进步的全部，只有以优秀的精神文化为导引，物质文化才能以人的方式、朝着人性化的方向良性发展，即从文化上升到文明。

史怀泽把文化进步比喻成大海中航行的船只，把人的伦理精神比喻成文化之舟的航行之舵，认为，决定这艘船航行“品质”的关键是它航行的方向和操纵是否得当，而不是它的航行速度及其动力帆或蒸汽机，因为“一切知识和能力的进步，如果我们不是通过精神上的相应进步而控制它们，那么它们最终就会产生严重的后果。”[13]如果“只在物质方面，而不同时也以相应程度在

精神方面发展”，那么，文化“就会像一艘不断加速航行而舵机受损的舱”，必将“失去控制并走向灾难。”[14]

史怀泽从文化的属人性和人的属文化性维度出发，把精神文化视为整个人类文化的内核或核心，强调精神文化就是人的生成，就是“野蛮人”上升为“自觉的人”的“梯级”，这与马克思主义的人学观也是基本符合的，正如列宁所说：“在人面前是自然现象之网。本能的人，即野蛮人，没有把自己同自然界区分开来。自觉的人则区分开来了。”[15]精神文化，正是人之为文化的人、文化之为人的文化的内在根据。

2.“敬畏生命”的伦理向度：扬弃异化文化的理想进路

既然我们的文化正处于严重的灾难之中，“它的物质发展过分地超过了它的精神发展。它们之间的平衡被破坏了。”[16]那么，如何扬弃异化文化呢？作为一位神学家，史怀泽在《要求和道路》一文中对此做了布道式的伦理呼吁。

作为两次世界大战的目睹者，史怀泽看到了文化异化特别是科学技术的异化对人类和地球生命所造成的巨大的、毁灭性的破坏，并把导致这一“破坏”的根源归咎于科学知识、物质财富的单一价值向度所导致的人类精神文化的丧失。因此，为了从源头上破坏这一“破坏”的根基，彻底扬弃异化文化，史怀泽主张重建人类的精神文化，即树立“敬畏生命”的生物平等主义理念。因为，在史怀泽看来，敬畏生命的伦理精神就是文化进步的核心，甚至就是文化本身或文化的本质，“文化的本质在于：我们的生命意志努力实行敬畏生命。”[17]

人类只有达到敬畏生命的伦理自觉，才算得上真正的人文化成。真正的文化人是能够做到以下几点的人：能够认识到自己与其他生命的休戚与共、“摆脱其余生物苦陷其中的无知”，并把这看成是赋予个人生命以意义的唯一途径；能够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同情、帮助、拯救周围所有的生命，并把这看成是善待自己的一部分；能够与其他生命共同体验我们周围的幸福，并把这看成是自己所追求的唯一幸福；能够与其他生命以共生为诉求，自觉地“反对个人德性”，并与他人、社会、它物“签署”欲望的“投降书”。只有做到了这些，我们才能算作“一个真正自觉的人”、一个“与世界共同生存的人”、一个“在自身中体验世界的人”。

只有敬畏生命的伦理学才是真正的人的伦理学。传统伦理学只涉及到人对人关系，是不完整的和残缺不全的“伪伦理学”，“伪伦理的诱惑使人像醉鬼一样，在罪孽中昏昏沉沉，跌跌撞撞。”[18]只有敬畏生命的伦理学才具有完全不同于只涉及人的伦理学的深度、活力和动能。“由于敬畏生命的伦理学，我们不仅与人，而且与一切存在于我们范围之内的生物发生了联系。关心它们的命运，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避免伤害它们，在危难中救助它们。”[19]也只有敬畏生命的伦理才能引导人们过一种真正文化的生活。“由于敬畏生命的伦理学，我们与宇宙建立了一种精神关系。我们由此而体验到的内心生活，给予我们创造一种精神的、伦理的文化的意

志和能力，这种文化将使我们以一种比过去更高的方式生存和活动于世。由于敬畏生命的伦理学，我们成了另一种人。”[20]

只有自觉做到敬畏生命，人才能从消极的自我否定转变为积极的自我肯定。敬畏生命的伦理信念可以是人们克服知识的“偏见”，保证人与自然的协调与和谐；可以使我们认识到由知识所带来的外部物质文化进步的虚假性，避免文化成为无“根”的文化。既然人是文化化育而成的，因此，只有经过敬畏生命的伦理文化熏陶和洗礼过的人，才能“产生重新成为真正的人的渴望，他才能从现在彷徨其中的、为知识和能力的骄傲自大所迷惑的失误中走出来。只有这样，他才能顶住威胁他的人性的生活关系的压力。”[21]只有敬畏生命的伦理信念才能使人摆脱贫乏的、得过且过的“现实”意识，激励人从事以文化为目标的行动，从而跳出自作多情、唯我独尊的人类利己主义巢臼，放弃对自然的虐待和榨取，以及对自然之“痛苦”的麻木不仁，并在任何时候都能把实现个人的精神和道德的完善作为文化的根本目标——同情生命、思考人生，在对自身物质欲望的否定中肯定自身存在的意义。“由于敬畏生命意志，我内心才能深刻地顺从命运、肯定人生。我的生命意志不仅由于幸运而任意发展，而且体验着自己。但愿我不要让这种自我体验消失在无思想中，而是充分认识它的价值，这样我就能领悟到精神自我肯定的奥秘。”[22]

史怀泽关于科学、伦理和文化的关系理论，为“人在何种意义上成为人”这个古老的“德性”问题提供了答案。在史怀泽看来，人的德性就是人能够将敬畏生命内化为自己的伦理信念，在德行中主动而非被动地保护和促进一切生命，并把这一切看作是自己人格的完善和自我价值的实现。敬畏生命的伦理德性不仅扬弃了伦理学史上尴尬的“不对称问题”和“后果论”问题，而且使这两个问题以及人的自我否定与自我肯定、自我与他人、自我与非人类的生命在道德实践基础上达到了高度的融合与统一，使人真正做到“化性起伪”——善待人类自身，兼济天下苍生。

但是，同时需要指出的是，敬畏生命的伦理拓展主义具有严重的泛“爱”主义倾向。史怀泽不明白，地球环境的破坏、生物多样性的减少、人与自然关系的紧张的背后，隐藏着的是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关系的危机，是资产阶级“利润最大化”信念的危机；不明白文化的发展的是一动态的、历史的过程，只有当历史进入到无阶级社会，文化成为所有社会成员自由个性全面发展的手段和结果时，成为保证人的社会化和个性化的社会基因时，文化才获得它自身的全面的社会意义和人的意义，到那时，人的文化与文化的人才能得到真正的统一，自然主义和人道主义才能得到真正的融合。

此外，史怀泽敬畏生命的文化观还具有浓重的神秘主义和蒙昧主义色彩，带有强烈的乌托邦性质。他认为“文化，作为能实现生命意志的最高体验的发展，它不需要世界解释就有世界意义。”[23]言外之意就是说，敬畏生命的伦理精神并没有什么哲学论证，也没有什么可靠的本体论证明，而只是一种依靠直觉或顿悟的“独断论”。这就决定了敬畏生命的伦理文化要从“天上”来到“人间”，真正化为人们的行为文化，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

参考文献：

[1] [2] [3] [4] [5] [6] [7] [8] [9] [10] [12] [13] [14]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阿尔贝特·史怀泽.敬畏生命[M].陈泽环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5.45-46.35.121.99.91.17.32.34.47.20.49.38.44.44.33.29.6.8.36.26.33.

[11] 奥里雷奥·佩切依.未来的一百页[M].北京:中国展望出版社.1984.78.

[15] 列宁全集(55)[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78.

(本文发表于《探索》2004年第4期。)

/